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论丛

翟满桂◎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论文选

翟满桂◎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论文选

翟满桂◎主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论文选 / 翟满桂主编.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1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论丛 / 翟满桂主编)

ISBN 978-7-5438-6867-0

I. 中… II. 翟… III. 古典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9964 号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论文选

出 版 人: 李建国

丛书主编: 翟满桂

本册主编: 翟满桂

责任编辑: 龙仕林 文志雄

特邀编辑: 谭 慧

编辑部电话: 0731-82683328 82683361 82683314

装帧设计: 杨丁丁 文志雄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0

字 数: 4 000 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6867-0

定 价: 360.00 元 (全 10 册)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论丛

湖南省十一五重点建设学科——湖南科技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湖南省省级优秀教学团队——湖南科技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

湖南省省级精品课程——湖南科技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精品课程

湖南省省级教学改革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评改革与实践

总序



湖南科技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中国汉语言文学系最主要的学科之一，该学科建设与我校原湖南师院零陵分院、零陵师专、零陵学院的发展同步，1971年创建中文科，招收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开始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程。在老一辈教师龙震球、何书置等的带领下，古代文学教学以及柳宗元、何绍基等地域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绩。1981年成立了柳、何（柳宗元、何绍基）研究室，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柳宗元学术研讨会，国内知名学者吴文治、苏渊雷、孙昌武、霍旭东、马积高、羊春秋等90余人参加研讨，这是国内柳学研究者的首次盛会。北京大学杜晓勤所著《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一书中对百年柳学进行了述评，认为此次会议“是本世纪召开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柳宗元专题研讨会，因而在柳学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1年，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被确定为校级重点学科，柳、何研究室提升为柳宗元研究所，继而又成立了舜文化研究所、女书暨瑶文化研究所、周敦颐研究所。2004年，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又被重新确定为校级重点学科。尤其是2002年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后，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驶入快车道。学科近5年先后4次承办和参加了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全国舜文化研讨会、周敦颐国际学术研讨会，协助本校学报30年来不间断地开设“柳宗元研究”特色栏目，使其于2006年获全国人文社科“百强”栏目称号。2006年8月，经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委员会专家评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被评为湖南省“十一五”重点建设学科；2009年5月，中国古代文学史精品课程经湖南省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评审，被评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2010年4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经湖南省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评审，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该学科现共有教师 14 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2 人;博士 6 人(博士后 1 人),硕士 4 人,学士 4 人;省级青年骨干教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3 人。年龄结构呈中青年化:50 岁以上 4 人,40~49 岁 7 人,30~39 岁 3 人,平均年龄 41 岁;学缘结构呈广泛性:分别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重点高校,受过严格而系统的知识训练,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健全,这种学缘结构既无近亲繁殖之虞,又有利于相互间取长补短、精诚合作。目前,本学科已先后出版著作和教材 35 部。近 5 年发表论文 356 篇,共完成和在研省部级立项课题 20 多项,获得省部级和市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 16 项。

本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经过“十一五”期间省级重点学科的建设,现已形成了四个比较稳定、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方向,即先秦汉魏文学与上古虞舜研究、唐代文学与柳宗元研究、宋元文学与周敦颐研究、明清文学与潇湘文艺研究。本学科的基本特色是学风朴实,基础扎实,注重地域优势和文本研究,将文学现象与学理论证有机结合,并充分利用研究特色,为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在省内外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为了展示本学科的群体科研成果,也为了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得到同行专家的关注与支持,我们编选了这套丛书。该套丛书共 10 本:《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论文选》共收录了本学科人员近年撰写的 50 余篇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共计 40 万字,文章涉及对虞舜、屈原、元结、柳宗元、周敦颐、杨时、何绍基等人的专题研究,尤其是对柳宗元的研究多有新见。《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课题选》共收录了近年湖南科技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于教育部、湖南省社科基金、湖南省教育厅等立项的 20 多项课题,课题涉及虞舜道德文化的研究,也涉及元结、柳宗元等文学成就与传播接受史方面的研究,具有浓烈的地域特性和参考示范性。《中国古代文学讲义选编》以本学科人员主讲的《中国文学史》为主干,配合以《历代文学作品选》及多门精读选修课程,精选从先秦文学到元明清文学讲义共 31 讲,每讲讲义力求用语规范,重点突出,难点深入,注重知识性与学术性结合,讲求条理性与系统性,并选取了一些较为生动的插图,较好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成果选》从学科教师撰写的 20 余篇教改论文中遴选了 13 篇,大致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省教改课题《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评改革研究与实践》的成果,二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思考和探索,三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与实践。此外,选集还选取了近 3 年来本科学生发表在省级以上刊物的 6 篇学术论文和 6 篇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它们是教学改革课题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展示,由此可体现教学改革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永州历史文献资料目录汇编》对永州历史文化相关的资料进



行了总目汇编，共收集有关目录数据上万条。涉及舜文化、元结与柳宗元文化、濂溪理学文化、怀素与何绍基书法文化、瑶族与女书文化等 18 个类别。这是永州地域内第一次从文献编目上对已有文化进行历时性的归整，是研究地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中国·永州第五届中国永州国际柳宗元学术研讨会论文 60 余篇，计 40 万字。涉及对柳宗元哲学思想、文学主张、政治主见以及师友、行踪等方面的探讨和考究。《柳宗元与舜文化研究》分为四个部分：文化考论、文化意蕴、文化认同和文化探源，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柳宗元和舜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潇湘之语》以其特立独行的视角，在潇湘之源开拓地方文化研究，辑录了作者近些年研究写作之文章，分别列为柳子篇、舜帝篇、师友篇、行吟篇等，个中有持之以恒的严谨学术探讨，更有似泣如歌的忧喜情怀倾泻，彰显潇湘渔人本色。《潇湘流韵》收录的是向孙萱先生近二十年来在各类期刊上所刊发的部分诗作，共分 7 辑 200 余首，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大好江河的咏赞及对时代发展的讴歌。《仰望西山》共收录 50 余篇发千古之幽情、思人间之正道的感悟性文字，有若散文之流畅，又若诗歌之精美，读来无不给人以精神的启迪。

该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湖南省教育厅“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学科与湖南科技学院的资助，湖南人民出版社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本丛书中的文章难免有疏漏与错误之处，我们诚恳地祈求专家学者提出批评意见，我们将虚心接受，并努力搞好教学和科研，使本学科的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翟满桂
2010 年 9 月

序



2006年7月18日这个日子，对湖南科技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古代文学学科通过专家评审被确认为湖南省“十一五”重点建设学科，步入了省级学科建设的快车道。近五年来，学科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科人员的科研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在《文学遗产》、《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文学研究》、《社会科学辑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求索》、《中国文学研究》、等国内重要刊物发表论文300多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核心刊物转载和摘编。我们编选这本论文集，因限于篇幅，从100多篇论文中挑选了40篇论文。收录标准主要以能反映作者的研究方向与学术水平为主，兼顾各阶段古代文学史与永州历史文化结合的研究特色。选录的作者中既有成果丰硕的教坛老将，又有年富力强、在学界脱颖而出的博士才俊，也有发愤而为的青年教师，为了学科的梯队建设与人才培养，收录的同一作者的文章最多不超过4篇。于此，还有许多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高质量的论文未能入选，颇有遗珠之憾。收录的论文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类：

一、对先秦汉魏六朝文学与虞舜的研究。该方向结合永州本土浓郁的楚文化特征，研讨《诗经》的礼仪文化与楚辞中祭祀巫术文化的特质以及楚地民俗对汉代文学的影响。如：王洪臣教授的《论〈诗经·周颂〉祭祀诗的特征》、《〈诗经〉之前乐诗文本在西周时期的编订》，张京华教授的《“经史子集”别解》以及潘雁飞教授的《从“在宗载考”看〈诗经·小雅·湛露〉的诗旨》、《〈庄子〉寓言思维及其后现代性精神影响》等文，对先秦文学中的经典及其特质进行了探讨。江建高教授的《略论古代昭君题材诗歌情感内涵的演变》，王洪臣教授《论阮籍、嵇康的文学叛逆精神

及其传承发展》以及周玉华博士的《曹植表文情感内蕴探析》等文,对汉魏六朝文学进行了个案研究,多有新见。该研究方向更值得关注的是对上古虞舜文化的研究。“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勤民事而野死”,“舜崩于苍梧之野,是为零陵”,永州学者得缘于这一地域优势,对有关中华道德文明之源的探寻及其古代文学的传承关系进行了探索。杨金砖教授的《虞舜〈南风〉对潇湘文学的豁蒙》、张京华教授的《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湘妃传说之六大文献系统》、潘雁飞教授的《论屈原赋中的舜帝意识》、拙文《孝道与先秦礼乐文明的文化源头》等,通过对舜文化这一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古老源头的发掘,不仅拓宽了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对古代文化、哲学伦理学、历史等学科之研究,亦有若多的启迪和建树。

二、对柳宗元与唐代文学的研究。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唐代以来,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柳宗元自三十三至四十三岁是在永州度过的。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把柳宗元与永州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一直是永州学者研究的重点。永州的柳宗元研究会和湖南科技学院的柳宗元研究所成为了海内外柳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协助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走遍中国”栏目录播了《柳宗元在永州》专题片;近十年举办了两次高规格的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坚持三十年来不间断地开设“柳宗元研究”特色栏目,2006年该栏目进入全国“百强”特色栏目,该栏目的特色在于崇尚实证,注重个案研究,地域色彩鲜明。从永州人文山水的独特视角审视柳宗元的诗文及思想,往往有新的发现,如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论屈原〈天问〉与柳宗元〈天对〉》,发表在一些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柳宗元谪居三考》、《细品韩柳话民本》、《柳宗元的补天理想》、《论柳宗元的永州意识》等。还有涉及柳宗元文学的接受研究,如《唐宋时柳宗元诗歌和散文不同的接受命运》、《柳宗元接受“拐点”的开拓者王安石》、《严羽〈沧浪诗话〉与柳宗元诗歌之接受》等文,注意到了柳宗元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当然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既突出了重点,又涉及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如《唐诗细节》、《唐诗杨柳情感内涵略论》、《物情无巨细 自适固其常——试论杜甫的生态诗》、《唐代山水游记人文精神论》、《李贺〈马诗〉隐喻性探析》等研究文章,值得一读。

三、对宋元文学与周敦颐的研究。岳麓书院文庙庑廊上有一副王闼运所作的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濂溪即周敦颐,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生于道州(今湖南永州道县)的营乐里濂溪保,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位居“北宋五子”之首。2006年永州道县承办了“首届周敦颐国际学术思想研讨会”。因此,这一研究方向的学者利用地域优势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文学以及周敦颐的文学与理学研究。如朱雪芳博士的《周子“中正仁义”二重进路》、《杨时对〈易传〉、〈中庸〉、〈孟子〉的阐释》、《道南一脉——从杨时到李侗》,青年教师王晚霞拟编撰出版《濂溪志八种校注》等,对周敦颐的文



学与理学思想做了有益的探索研究。《〈全宋诗〉邢恕十首考误》、《论宋词传播对宋词发展的影响》等文，对宋代诗词的个案考证和接受亦进行了新的解说。

四、对明清及其潇湘文学的研究。潇水与湘水在永州城区的江心岛萍洲相聚，汇成泱泱潇湘大观，然后再北下洞庭。由于潇水、湘水发源于南岭山地而以山水秀美著称于世，又因其自南向北贯穿湖南全境，因而湖南雅称潇湘。“潇湘”最初只是一个地域性的名词，但它又与“帝之二妃”的传说故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发展成为充满着丰富文化内涵的称谓。因而该方向研究注入了“潇湘”特色。其主要内容包括明清文学文本中的潇湘意象、明清诗学对潇湘文艺的影响、潇湘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以及潇湘文学的流变过程等。如选录的《〈爱莲说〉对潇湘文学的承继及影响》、《元结对潇湘文学的开掘》等，揭示了潇湘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一部分还涉及明清碑刻文化和文献考证研究，如《朝阳岩与寓贤祠》、《文科论文写作范例研究——百年〈尚书〉“文”字考及其意义》等。

当然，以上各方向的研究，由于学术力量的分布不一，研究水平的参差不齐，反映的研究成果及其水准亦不一。有的论述或许显得稚嫩，但他们却反映了一个学术团体的研究特色，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个团队的成长过程。学科建设不仅是一个建设的过程，更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我们时刻注视着年轻学人的成长，我们真切地希望躬耕于古代文学园地的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学人，都有自己的收获。

作者

2010年11月于西山

目 录



- 孝道与先秦礼乐文明的文化源头 翟满桂 / 1
- 虞舜《南风》对潇湘文学的豁蒙 杨金砖 / 7
- 《诗经》之前乐诗文本在西周时期的编订 王洪臣 / 17
- 从“在宗载考”看《诗经·小雅·湛露》的诗旨 潘雁飞 / 23
- 论《诗经·周颂》祭祀诗的特征 王洪臣 / 29
- 一种训诂、一种礼制和一章诗的意味
——《诗经·大雅·行苇》“四鍬如树”新释 潘雁飞 / 35
- 论讽喻文学在先秦时期的发展 王洪臣 / 40
- 《庄子》寓言思维及其后现代性精神影响 潘雁飞 / 45
- 论先秦文学的叛逆精神 王洪臣 / 51
- 论屈原《天问》与柳宗元《天对》 翟满桂 / 57
- 论屈原赋中的舜帝意识 潘雁飞 / 64
- 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湘妃传说之六大文献系统 张京华 / 70
- “经史子集”别解 张京华 / 80
- 略论古代昭君题材诗歌情感内涵的演变 江建高 / 95
- 曹植表文情感内蕴探析 周玉华 / 103
- 论阮籍、嵇康的文学叛逆精神及其传承发展 王洪臣 / 109
- 唐诗细节 江建高 / 115
- 唐诗杨柳情感内涵略论 江建高 / 118
- 物情无巨细 自适固其常——试论杜甫的生态诗 江建高 / 124

- 我生苦飘零 所历有嗟叹——论杜甫后期诗歌的自传性 江建高 / 134
- 唐代山水游记人文精神论 周玉华 / 142
- 柳宗元谪居三考 翟满桂 / 147
- 元结对潇湘文学的开掘 杨金砖 / 155
- 细品韩柳话民本——韩愈、柳宗元民本意识之比较 龙国庆 / 164
- 李贺《马诗》隐喻性探析 周玉华 / 169
- 柳宗元的补天理想 夏卫平 / 177
- 论柳宗元的永州意识 夏卫平 / 183
- 《爱莲说》对潇湘文学的承继及影响 杨金砖 / 190
- 周子“中正仁义”二重进路
——“性焉安焉”与“复焉执焉” 朱雪芳 王晚霞 / 199
- 《全宋诗》邢恕十首考误 张京华 / 203
- 杨时对《易传》、《中庸》、《孟子》的阐释
——以本体论为中心 朱雪芳 / 213
- 道南一脉——从杨时到李侗 朱雪芳 / 226
- 唐宋时柳宗元诗歌和散文不同的接受命运 杨再喜 / 233
- 柳宗元接受“拐点”的开拓者王安石 杨再喜 / 240
- 严羽《沧浪诗话》与柳宗元诗歌之接受 杨再喜 / 247
- 宋人接受柳宗元诗歌在理论上的成熟
——以刘克庄《后村诗话》为中心 杨再喜 / 253
- 论宋词传播对宋词发展的影响 蒋扬帆 / 262
- 论宋词的传播条件与方式 蒋扬帆 / 270
- 宋词的传播内容与传播功能 蒋扬帆 / 281
- 文科论文写作范例研究
——百年《尚书》“文”字考及其意义 张京华 / 291

孝道与先秦礼乐文明的文化源头

翟满桂

虞舜是上古传说人物。以其名号为旗帜的舜文化承载着孝道内涵，在先秦时期通过礼乐文明向着社会广泛传播，成为展现古代文明社会的重要窗口，更是成就中国礼仪之邦的开端。

一、巫术是承接礼乐文明过渡的桥梁

占问吉凶的巫术，早在上古时代的原始社会各民族部落中产生。人们为了获得食物或者消除疾病，各自施行巫术，求得对个人的好处。在那个时代的巫，其内容与形式有机地融为一体，以获取与自然抗争的神秘力量，虽然常常由部落的首领兼任，但也是人人可为、普遍性很广的事情。经过千百次的探索、失败、再探索的实践，这种人人可为的巫，成了后来的内外科医生包括自然科学各个分支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直接前辈。“蛮夷氏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1]。对于上古时代来说，巫是非常普遍而重要的社会现象。

随着先民发明用火，将生食改为熟食，食物来源由采集狩猎发展到种植圈养，农耕文明得以发展。追寻舜文化所形成的时代，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阶段。这是古代文明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与其相衔接的夏王朝目前虽然也没有发现文字记载，但近些年在夏县东下冯和登封王城岗等地，先后发现距今四千年的夏代城堡，证明了它的存在。随之而来的商周、春秋战国至秦统一时，统称为先秦时代。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的重大变化，就是农耕文明的兴起，推动着家庭乃至国家的出现，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剧烈的变化。这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个灿烂巅峰。作为中华道德文明原点的舜文化，融合于先秦礼乐文明之中，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

社会的发展在给氏族部落带来了能够存储并且相对剩余的产品的同时，也让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祈求良好的天气以保证作物丰收，变成了社团人们共同的愿望，就让专门的巫师来处理，而不必人人都来施行相同的巫术。这种逐步明确只有少数人使用的权力，催生了社团之内等级的明朗化，属于社会

[1] 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上层的人们将它纳入自己的统治手段。“为君者，惟以奉天事神为务”^[1]。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情况下，社会生活方式也在变革。巫由于它的神秘性和权威性，被分离了出来，成为社会统治阶层这一部分人“奉天事神”的专利。《国语》中的“观射父论绝地天通”，讲的就是由母系氏族公社制度瓦解到父系家庭私有制确立的过渡时期，新兴的奴隶主贵族垄断了与神灵交通的特权，“家为巫史”，人人有权与神相通的原始宗教局面被改变了。于是，原始社会的“自发的宗教”，演变为新的等级社会中的上层阶级的政治工具。在这种转变中，巫卜文化随之产生，巫术成为引领文明进程的重要通道。巫卜文化最初孕育在原始宗教仪式的土壤里。“以幻想支配机遇，预测事变，消祛灾祸，是巫卜文化产生的心理机制。原始社会的巫，是在图腾崇拜的巫术仪式中出现的，最初由部落酋长担任，并非专职，他们精通生产技艺，又熟悉巫术动作，善于舞蹈。他们是崇拜仪式的执掌者，也是神的扮演者，在巫术仪式中，行使着传授生产经验和超自然的巫术力量的双重职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统治阶级垄断了神权，巫便成为专门的神职人员，其主要社会职能是通神明，卜吉凶，明休咎。他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占卜”^[2]。殷人凡事必先占卜而后行，听命于鬼神的“旨意”。据1955年出版的《殷墟发掘》统计，河南安阳出土的龟甲兽骨多至16万片以上，内容几乎全是卜辞。事实表明，巫卜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不仅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实实在在地牵引着古代文明的进程。甲骨卜辞记事年代是从盘庚到纣辛，是殷商后半期的重要文献。由于甲骨狭小以及占卜所记录的内容简单，每片甲骨上的卜辞大多寥寥数字，但也有百字以上的长辞。甲骨文在结构上已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四种形式。甲骨文的字形尽管尚不稳定，但其结构的基本方法已为汉字奠定了基础。作为上古文献的萌芽，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思想核心，是神权观念统率一切。《周易》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与甲骨卜辞相差无几，但其反映社会生活层面所展示的思想意义和精神内涵却与甲骨卜辞明显不同了。它广泛而充分地运用象征手法，是礼乐文明孕育的理性精神的觉醒。“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3]。从乾坤之道看男女世界，演绎社会人生的道理，“有亲则可久”，将亲缘之情作为可久之德，真社会的大智慧也！

二、孝道将巫卜提升为礼乐文明

长幼亲情是生物界延续生命的本能，而“孝”则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伦理道德。

[1] 郑樵：《通志》卷二《五帝纪二》。

[2] 蔡守湘：《先秦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3] 《周易·系辞上》。

家庭是社会进步的结晶。孝道随着家庭的出现得以产生，成为这一社会基本单元之上的伦理道德。钱穆说：“中国社会伦理，乃奠基于家庭，而家庭伦理，则奠基于个人内心自然之孝悌”^[1]。这一判断是十分精到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用了较多的篇幅，记叙了舜“以孝闻”的故事。舜父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瞽叟“使舜上涂廩，瞽叟从下纵火焚廩。舜乃以两笠自蒂而下，去，得不死”。瞽叟安排舜穿（掘）井，舜预先作了防范，在井的旁边开了个小巷道。“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舜多次遇害，都凭借自己的机智得以逃脱，而且“复事瞽叟爱弟弥谨”。无论在何等恶劣的家庭环境当中，舜始终如一地笃诚孝悌，以德报怨，首倡了人伦道德之风。于是，孝道以舜为旗帜，作为社会家庭的道德规范应运而生。《尚书》：“重民五教，惟食、丧、祭”，“德至舜明”^[2]。《史记》也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3]。

孝道直接地影响着将巫卜提升为礼乐文明。在原始的巫卜文化中，对祖先亡灵的崇拜与纪念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孔子云：“祭如在。”（《八佾》）祭祀是人们与上界冥间沟通的普遍方式，所有的祭祀都表达了祭者的主观愿望。当以孝道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提升着巫卜祭祀向礼制方向发展，即产生出新的礼乐文明。所谓礼，在巫卜来说一开始仅仅是祭祀的步骤，是一种企图与上天神灵沟通的台阶。关于乐，则是由歌乐、舞蹈发展起来，与礼相辅相成的表演艺术。关于乐舞的起源，世界上有多种说法。一是摹仿说。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都主张此说。我国古代《吕氏春秋》也有音乐摹仿自然之说：“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效八方之音”^[4]。二是游戏说。席勒和斯宾塞提倡此说。三是性本能说，以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论为代表。四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情动于中”的说法。“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5]《礼记》更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之声，声相应而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及干戚羽毛谓之乐。”^[6]以上诸说，都因脱离了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实践，而陷入片面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劳动创造一切，歌乐与舞蹈来自于劳动生活。我国古代文献也有类似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7]；“筑城相

[1]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论丛》（1），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88页。

[2] 《尚书·武成》。

[3]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4] 《吕氏春秋·古乐》。

[5] 《诗大序》。

[6] 《礼记·乐记》。

[7] 《淮南子·道应训》。

杵之歌，顿地为节”^[1]，把这类“举重劝力之歌”、“筑城相杵之歌”，作为最早的节奏和旋律。鲁迅则以现代语言说得更加明确：“我们的祖先的创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2]青海上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有舞纹，舞蹈史家孙景琛认为其内容是“模拟鸟兽的舞蹈”^[3]。还有学者认为“拉手成围的舞姿是由游牧劳动中拦截羊的动态演进而来的”^[4]。这些看法的共同趋向，都是基于歌乐舞蹈是先民生产生活的写实反映。《尚书》中所说的“鸟兽跄跄”，“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5]，也是指人们装扮成各种动物而跳的拟兽舞。然而，这些都还是歌乐舞蹈的萌芽。“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6]，乐舞的成熟，是祭司和巫师们的工作结果。通过祭司和巫师们的努力，祭乐成为与祭礼相伴相生、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巫术是实施祭祀的神秘而可靠的方式。通过演绎巫术繁缛的礼节，扩张推进其神秘性，确保了礼乐文明的高尚。

礼乐文明，就是在上古先民们对天地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祭祀活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胡适曾以较简洁的话语作了概括。他认为：“礼之进化，凡三时期，第一，最初的本义是宗教的仪节；第二，礼是一切风俗习惯所承认的规矩；第三，礼是合乎义理可以作为行为规范的规矩。”^[7]尽管原始的巫术并不等同于宗教，但这个“行为规范的规矩”的核心内容就是孝道。也就是因了这种景仰的活动，礼乐文明逐步被铺衍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8]的天纲大法，在先秦时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三、忠君是孝道在礼乐文明的扩展

《春秋左传》：“祀，国之大事也。”^[9]先秦社会的上层统治者非常看重祭祀，规矩也非常多。《礼记·曲礼下第二》：“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这是天子的祭祀；“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这是诸侯的祭祀；“大夫祭五祀，岁遍”，这是大夫的祭祀；“士祭其先”，这是士的祭祀。这仅仅是对当时上层社会的一处记载，就有了这样多的不同层次，而且祭祀的礼器、牺牲、程序、方式等也因之不同。《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

[1] 《宋书·乐志》。

[2]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3] 孙景琛：《试论彩陶盆上的舞蹈图》，刊《舞蹈艺术》第三辑。

[4] 于平：《“万”舞与蛙文化》，刊《舞蹈论丛》1989年第一期。

[5] 《尚书·尧典》。

[6] 《通志·乐略·乐府总序》。

[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8] 《左传·隐公十一年》。

[9] 《春秋左传·文公十四年》。

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樛燎祀司中、司命、觐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百物”；“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肆师之职，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因循此例，大宗伯、小宗伯、肆师等专职祭司均有分工，在各种祭祀中分别担任了不同的职责，确保司掌祀礼的到位。

礼乐文明之所以在先秦时期位置显赫，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上层统治者强化王权政治的重要工具。“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1]从天地万物到男女夫妇，从父子君臣到上下礼义有致，《周易》将孝道向忠君扩张，描摹了一幅美好的社会政治图景。《礼记》：“孝以事君，悌以事长，示民不贰也。故君子有君不谋仕，唯卜之日称二君。”^[2]所谓“孝以事君”，即君等同于父，对待国君如同侍奉父亲一样要用孝道。换言之，君王就是君父，君子即为君父的儿子。《庄子》：“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也。”^[3]其所言孝与忠，连接子与臣，家庭内的父与子的关系通过孝君、忠君，已向国家之君与臣的关系转换。其内容形象而具体，涵盖面也更为广泛丰富。包括礼乐文明本身的礼与乐，也有着分别的政治功用。《礼记·乐记第十九》：“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则治道备矣。”这样，以舜的名号为旗帜的孝道文化，已经从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孝道基础上扩张。对于王权而言，家即是国，管理臣民就是施行孝道；对于臣民来说，国也是家，忠君就是尽孝道。家庭父子关系被应用到国家君臣的政治关系当中，伦理道德被延伸扩大为政治道德。忠君成为孝道的政治取向，臣民爱国爱君如同孝敬父母、热爱家庭一样的重要，通过将家庭伦理道德的孝衍化为对国家君王的忠，来规范国家、社会的政治关系。孔孟等儒家都是先秦礼乐文明的重要鼓吹者。孟子“言必称尧舜”^[4]。《孟子》一书提及舜者达50处之多，这在先秦各类典籍中都是罕见的。孟子对舜的至孝顺亲极其推崇。“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5]。孔子到了五十岁，都还在仰慕体验舜的孝道。“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

[1]《周易·序卦》。

[2]《礼记·坊记第三十》。

[3]《庄子·天地》。

[4]《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5]《孟子·告子章句下》。